

文化寻真

人类学学者访谈录
(2005~2015)

主编 谢尚果 秦红增

IN THEIR OWN VOICES:
Anthropologists on Culture, Truth
and the Pursuit Thereof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教育部名刊·名栏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人类学文萃

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N THEIR OWN VOICES: Anthropologists on Culture, Truth and the Pursuit Thereof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化寻真

人类学者访谈录
(2005~2015)

上

主编 谢尚果 秦红增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人类学文萃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人类学文萃



主 编

谢尚果 秦红增

编 辑

廖智宏 韦光化 黄世杰 胡宝华

目 录

CONTENTS

上 册

- C 漂泊中的永恒与永恒的漂泊 1
问 / 徐杰舜 答 / 乔健
- C 走过西藏 走进北京 19
问 / 吴健玲 答 / 马丽华
- C 民俗学与人类学 28
问 / 罗树杰 答 / 刘铁梁
- C 人类学释放我的灵魂 43
问 / 徐杰舜 答 / 翁玲玲
- C 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态势 59
问 / 徐杰舜 答 / 黄淑娉
- C 我想象中的人类学 71
问 / 徐杰舜 答 / 王铭铭
- C 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中国”的构建 102
问 / 徐杰舜 答 / 张应强

把基因分析引进人类学	113
问 / 徐杰舜 答 / 金力	
遗传结构与分子人类学	132
问 / 徐杰舜 答 / 李辉	
人类学与国学	142
问 / 徐杰舜 答 / 王庆仁	
从摇滚乐到人类学	151
问 / 徐杰舜 答 / 张原	
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70
问 / 徐杰舜 答 / 陈华文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	185
问 / 徐杰舜 答 / 曹锦清	
阅尽山林求学问	204
问 / 陆萍 答 / 尹绍亭	
多元学术与多元人生	217
问 / 章梅芳 答 / 刘兵	
和平跨居与文化共享	226
问 / 秦红增 答 / 周建新	
图像时代的视觉人类学研究	234
问 / 黄世杰 Senkey 谢勤亮 答 / 邓启耀	
人类学研究应该加强概念提炼	253
问 / 殷鹏 关祎 答 / 张继焦	
约己以让，持之以恒	260
问 / 李锦 答 / 李绍明	

探寻新范式，生发元范畴	274
问 / 付小月 答 / 袁鼎生	
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探索	288
问 / 秦红增 答 / 陈阿江	
乡土教材：收藏、研究与开发	305
问 / 班红娟 答 / 滕星	
下 册	
耕耘在客家研究的田野上	315
问 / 吴良生 答 / 罗勇	
只要文化存在，草原就能够得到保存	325
问 / 徐杰舜 答 / 齐木德道尔吉	
南岭走廊与瑶族研究	344
问 / 秦红增 答 / 玉时阶	
做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呵护人	353
问 / 李焱 答 / 曾羽	
广征语言事实 阐发奥义于微末	360
问 / 何彦诚 答 / 李锦芳	
旅游其实嵌入生活的许多方面	375
问 / 徐杰舜 答 / 纳尔逊·格拉本	
文成于思，思源于学，学积于勤，勤决于志	391
问 / 秦红增 答 / 胡安顺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记录社会变迁中的一代人	399
问 / 王小璐 答 / 风笑天	

◎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 ——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415
问 / 秦红增 答 / 何明	
◎ 教育人类学的实践与反思	427
问 / 海路 答 / 袁同凯	
◎ 一生致力于边疆跨国民族和谐稳定发展	439
问 / 罗柳宁 罗家珩 答 / 马曼丽	
◎ 藏学研究的文化自觉	445
问 / 黄世杰 答 / 袁晓文	
◎ 多元文化与多种生态类型之间的复合	455
问 / 秦红增 答 / 杨庭硕	
◎ 语言：解答人类未来重大问题的钥匙	462
问 / 韦茂繁 答 / 潘悟云	
◎ 老龄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468
问 / 邝建立 答 / 莎伦·考夫曼	
◎ 地域文化小说与民族文化书写	487
问 / 温存超 答 / 黄佩华	
◎ 中国教育人类学新进展	497
问 / 巴战龙 海路 陈学金 答 / 滕星	
◎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义	510
问 / 徐杰舜 答 / 杨志强	
◎ 民族典籍翻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522
问 / 张媛 答 / 王宏印	
◎ 中国传统医学的人类学研究	529
问 / 赖立里 答 / 冯珠娣	

千灯互照，光光交彻	534
问 / 陶金华 答 / 纳日碧力戈	
南岛民族与岛屿东南亚社会的比较研究	546
问 / 区纘 答 / 蒋斌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	563
问 / 孙国良 答 / 行龙	
追寻原创的思想叙述	573
问 / 范靖鸣 答 / 庄孔韶 瓦努努	
汉民族研究：历史的建构与建构的历史	579
问 / 刘冰清 答 / 徐杰舜	

漂泊中的永恒与永恒的漂泊

问/徐杰舜* 答/乔健**

摘要：乔健先生 50 年的人类学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台湾的高山族，第二个阶段研究美国的印第安人、香港的民间风俗和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第三个阶段研究汉族社会。乔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认为做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和成年礼。同时，他强调理论学习和本土研究。

关键词：学术生涯；田野调查；本土化

问：乔先生，您是我们中国人类学的一位前辈，从事人类学研究已有 50 多年了吧？

答：我是 1954 年进台湾大学的，1955 年从历史系转入考古人类学系（1982 年后改称人类学系），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从事人类学的研究。

问：那就是将近 50 年了。今天是正月初九，在猴年开始之际，有机会采访先生，十分荣幸。我想首先请乔先生对自己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做一个学术的回顾。

答：好！我 1954 年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我自己比较喜欢旅游，我想，学人类学可以到许多地方去走走，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就干脆去念人类学吧！于是就决定从历史系转到人类学系。结果转过去的时候，本来系里有九个学生，除了有一位，就是王松兴因生病休学外，其他的全部转走

* 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 乔健（1935～），男，山西人，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教授兼院务顾问。

了，我进入人类学系后，便成了唯一的学生。第一届是两个人，就是唐美君、李亦园先生他们两个人。唐美君已经过世了。第二届就是张光直他们，共三位。其他几届也是两三个这样子，我是第六届，是最少的，只有我一个。但在我之后，人就多起来了。所以我常说我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为我下一届就是八个人，以后人就越来越多了，考古人类学系就不再是那么冷的一个系了。

我的第一个阶段，先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以后，又考入研究所，在研究所待了三年。我一方面是做研究，另一方面又当助教，所以可以说在台湾我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55年开始。1955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做田野调查，从那时开始到1961年7月出国，到康乃尔大学攻读人类学的博士，这算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台湾高山族，那个时候，这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重点，人类学比较流行研究所谓的异文化。台湾高山族，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宝藏。当时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一些教授都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精英，李济、凌纯声、芮逸夫等都是大师，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尝试过去研究台湾高山族，可见这是当时系里的一个重点。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一部分是民族学的，一部分是考古学的。题目是《中国境内的屈肢葬》，大陆的部分完全是根据考古报告，这个论文是李济先生指导的，但是，台湾的部分是民族学的调查，所以可以说我的论文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结合。当时台湾的高山族还有屈肢葬，我的运气不错，1958年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在台北过年，我去屏东县调查排湾族，正好在一个部落里头看到一个老年人过世的全部过程，正好是屈肢葬。据我所知，恐怕这也是唯一一个关于台湾屈肢葬的民族学报告，而且有照片的记录。不过我依自己的兴趣，那个时候在弄文化人类学。在台大也好，后来到了美国也好，人类学一定包括四种：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还有语言学，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类学家，这四样东西都要会。不过在大学念完了之后，我的兴趣主要在民族学，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以我到了研究所以后，还是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在研究所的硕士学位论文我集中研究卑南族，卑南族是我最早研究过的一个民族。卑南族当时已经开始受到人类学界的注意，它所谓的一种非单系社会亲属组织。因为我们平常观念认为，这种单系的社会，像我们中国是父系社会，纳西族是母系社会，都是单系，但是像美

国、英国他们这种就是双边，因为他们不往上追，说亲属关系的时候只是到三四代，到曾祖父这一代为止，这种叫作双边，英文叫 bilateral。所以，早期的人类学家在讨论这种世嗣制度的时候，主要是这三种。但是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的时候，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他们就发现了一种非单系，有一种制度叫 ambilineal，就是两可，可以父系，也可以母系，是很复杂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正好是在太平洋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人类学方面研究亲属制度最有名的经典著作，就是 G. P. Murdock 的《社会结构》。这本书是 1949 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他只看到亲属制度主要是这三种：父系、母系、双边。其实还有一种叫作 double descent，就是双系，非洲有些地方有的人是同时从父系和从母系的，他相信他自己的这个灵魂是从父亲这边来的，肉体是从母亲这边来的；不动产是从母亲这边继承的，动产是从父亲这边继承的。他们有时候从父系，有时候从母系。这种情况 G. P. Murdock 在 1949 年都没有发现。到了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才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对卑南族我自己感觉到很特别，很多日本的人类学家也说它是两可型的，所以我特别选了卑南族。卑南族又叫八社番，一个是知本社，就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系统是很清楚的两可型。另外一个南王，这个就很难说了，它也可以说是母系的。但至少知本是很标准的两可型，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知本系统里头的一个大社，叫作吕家，我研究的就是这个卑南族吕家社的社会组织，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台东县卑南乡利嘉村。我在这个地方住了半年，写硕士学位论文，所以在台湾我主要做的研究工作是研究台湾高山族。

我 1961 年出国，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念博士学位。到了美国以后，我选择去康乃尔。那时我对美国的大学了解也不多，正好认识一些美国的留学生。我大学时有两个地方给我奖学金。哥伦比亚给我奖学金，康乃尔也给我，但是康乃尔大学的奖学金是属于助教的奖学金。那些美国朋友都说，你不要去哥伦比亚，那个地方太乱了，康乃尔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去康乃尔。我就听他们的意见，到康乃尔去。康乃尔是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中最年轻的一个学校，我们早期的一些中国学生，像赵元任啊，都去过那所学校。胡适也是，到康乃尔之后他是研究苹果，读“苹果系”，后来他对哲学有兴趣就转到哥伦比亚哲学系去了。康乃尔那一带环境很漂亮，不过就是比较偏僻。康乃尔有个传统，即人类学的四

个领域你都要修，不可以只专修一种，现在可以专修文化人类学了，那时候不可以，就是都要懂，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遵守这个传统。不过那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到美国去念书都是选中国研究做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我自己总觉得，人类学应该是研究所谓的异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应该研究自己的文化，而且尤不该到了美国反而来研究中国文化，所以心理上有一种抗拒的感觉。在当时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就是威廉姆·斯金纳（William Skinner），他研究中国的市场。威廉姆·斯金纳就是我的导师，但是我觉得不太对劲，一方面我觉得我不应该研究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我对他对中国的一些解释不太同意，所以搞了一年以后，我毅然决定不跟他。正好有一位先生在我修的课里面作了一个演讲，我对他的东西很有兴趣，他对我也很有兴趣。他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叫约翰·罗伯茨（John M. Roberts），他就是我刚才说的 Murdock 的学生。我就想：去跟他一年也不错。所以想了半天以后，我就去跟罗伯茨说想跟他学，他说很欢迎我。于是我就去跟斯金纳说我想换导师。斯金纳当时非常吃惊，他很不高兴地问：“你决定了？”我说：“我决定了。”他很不高兴。结果第二天，他就给系里一封公开信，就是任何人接收我做学生，当我的导师的话，必须再对我进行一次资格考试。我那时候已经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已经是博士候选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合法的要求，因为你已经通过了，不可能把你的通过撤回。当时，罗伯茨说他既然坚持，那只好形式上让我考，但是不能向学校报，因为学校是绝对不接受的。所以第二天，因为斯金纳的这个通知，我到了系里，老师们看到，都说这是第一次学生主动要求换导师，只有老师要求换学生，没有学生要求换导师的，学生把导师给辞掉了。不过我想我这个决定还是对的。

这样我的第二个阶段就从跟罗伯茨学习开始。那时候他正好拿到美国的 NIMH 即国家精神卫生部的研究经费。那个时候 NIMH 大概是支援人类学最多的一个，很多人类学的计划是它支援的。那时候罗伯茨有一个相当大的计划叫 models of culture（文化的模式）。他准备在美国的西南部调查比较四个族群，一个是拿瓦候人（Navajo），一个是住在美国境内的墨西哥人，还有一个是摩门教徒，然后就是他自己研究过的 Zuni 印第安人。我就负责关于拿瓦候人的研究。从 1964 年开始，我们两个人首先去拿瓦候，短

暂地去过一次，秋天去了一次。然后 1965 年的春天，又是我跟他两个人去新墨西哥州。那里有一个人类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很多前辈对拿瓦候人的研究成果，早期的很多前辈都在这里研究过。我们就在这里查，查完以后，就到新墨西哥一个叫雷玛（Ramah）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美国人类学家 Kluckhohn 休养的地方。这个人本来是研究心理学的，早期他因为身体不好，在这个地方休养。因为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舅母叫 Vogt 太太，在这里经营一个家庭旅馆，专门给那些游客，特别是人类学家提供住宿。很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像克鲁伯（A. L. Kroeber）都在她那里住过。Kluckhohn 在那里住下来以后，就开始接触拿瓦候人。由于与拿瓦候人的接触，他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慢慢就转到人类学方面去了。我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来慢慢开始进行这些研究，最后我们选定拿瓦候比较偏僻落后的地方，当然也是传统文化保留最好的地方，它就在阿里桑纳（Arizona）的东北部，美国在地理上叫作四角地区（Four corner area）。为什么叫四角呢？因为它正好是四个州的交汇处。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自己买了一部福斯车，这种车的底盘特别高。拿瓦候保留区山多，都是土路，普通汽车无法开。我在那里专门研究拿瓦候的祭仪。他们的祭仪有 30 多种，每一种祭仪都主要是治病。这些仪式，至少唱一个晚上，最多是唱九个晚上。我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看怎么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我这次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把我原来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个时候，我的兴趣，主要是在美国研究印第安人。

在康乃尔念完博士后我就去教书。我第一个教职是在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重镇，那里有两位大师，一位是 Hargold E. Driver，他是克鲁伯（A. L. Kroeber）的学生，是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很流行的著作，就是《北美的印第安人》，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经典著作。另一位是研究语言学的 Voge Carl，是 Edward Spear 的学生，李方桂的同学。印第安人的课程，主要是 Driver 来教，如果他不在，我也开这门课程。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也要开始教关于中国方面的课。我开了两门课程，一门是中国文化，一门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变迁，这个是第一学期的课。这样，我一方面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也因为教课的关系，开

始注意中国方面的一些变化，也写一些关于中国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个是根据文献来写的，后来发表了。在那里我待了七年，但是实际上只有六年，因为有一年我回到台湾了。1970年到1971年，我回到“中央研究院”去作访问。在这一年内，我又回到了卑南族去进行调查。到了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要成立人类学系。他们邀请我，说是希望我过去，我就答应了。我从来没去过香港。原来的计划是只待两年，但是第一年，1974年碰到了石油危机。这是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所以成立一个新的系是不可能的，于是成立新系的计划就搁了下来，我们只能在社会学系里成立了一个人类学组。社会学系里本来已经有一个组了，是心理学组。我原来还是希望两年后就回到印第安纳大学，所以就向大学请了假。到了两年以后，1975年我应该回去了。可是我太太和我小孩喜欢香港，而且我太太在香港有很好的工作，他们两个人不肯回去。这样我们在香港又待了一年，到了1976年是一定要回去了，印第安纳大学把我的课也排好了，但是他们两个到了最后关头还是怎么也不肯回去。印第安纳大学一到七月份课程都已经排好了，我都不好意思向印第安纳大学辞职。我只好请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认识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香港中文大学确实需要这个人留下来，他们那里人才多，希望他们再找人，他写了一封信替我辞职。辞掉以后，从此就在香港待下来了，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阶段。

1976年，我们决定在香港待下来，夏天就回到美国，把家搬了过来。所以实际上，1966年到1976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1976年以后，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学正式住了下来。到了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

香港是一个相当商业化的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人类学都是一个冷门，大学不大愿意投资，所以要让社会认识它，让社会认识以后，你才能走下去。所以我在1978年的时候，就和一些当地的学者，主要是西方的人类学家，办了一个香港人类学会。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们人类学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香港电视台最大的一个无线电视台有一个连续剧，好像是叫《香港82》。它是每年有一集，每一集是一小时，讲一个故事，《香港82》就是1982年的香港出现一些什么。有一集里头，讲一家发生的事情，那一个家的一个男孩考上了大学。他的哥哥是一个比较实

际、势利的人，他哥哥问他考了哪个大学，他说考了香港中文大学。他哥问是哪个系呀？ he说是人类学系。哥哥便说：“你怎么去考什么人类学系？那是专门研究猴子的系！”他弟弟的话更让人生气，他说：你看我这个成绩能进到别的系吗？所以我们学生就向他们抗议。香港无线电视台向我们道歉。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就请我们人类学系的老师去上节目向他们解释什么是人类学系。可见当时人类学系还是很冷门的一个系，直到现在人类学系在香港也不是一个热门的系。不过成立这个系可以说，就整个中国来讲，除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以外，我们还是第一家。我们是1980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是1981年成立的，厦门大学是1982年成立的。

人类学系成立后，我们必须找地方让学生实习，那时我还是坚持这个观念：要找一个异文化。香港周围最近的就是瑶族，所以我们就选定了瑶族，就是连南的排瑶。我自己也开始做瑶族的研究。1986年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也成立了国际瑶族协会。那个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国际会议。我们得到广东的支持，同时国家民委也给了一些支持。当时费孝通先生也来参加了，但他只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会。我们的会从香港开到广州，然后从广州，我记得当时是有六部车，浩浩荡荡，警车开路，一直开到连南去，所以那个声势是很大的，一下子把瑶族研究给炒热起来了。从那时起，我们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国际瑶族会议，中间还做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开始那一段就弄得很热闹了。到了1990年，第三届，我们在法国图鲁兹开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因为我发现瑶族的研究，过去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有很多文献，如果我要继续做下去，我必须放弃其他东西，集中专门研究瑶族，当然要学习瑶语了。但是这时我就开始想，我过去都是在研究所谓的异文化，到晚年了，我觉得应该开始研究一下自己的文化。所以到差不多90年代初期，这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的研究。我还去过一次西藏，对藏族做了一些研究，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我去过不少。在90年代初期，我逐渐结束了对异文化的研究，退出了瑶族学会，开始把精力放回汉人社区。到了晚年，我自己想研究一下我自己的社会。

正好这时候，山西一位老先生，就是原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刘

贯文先生，经过香港，来看我。他跟我提到山西的乐户。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在1993年我特地跟他去了一次，到山西晋东地区看了一下，确实很有意思。从1994年开始我便研究山西的乐户。我还邀请了李天生先生，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到1997年弄完，书稿已经出来了，这本书好像是2001年出来的，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那本2003年才出来。这两本书出来了以后，我就开始对乐户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做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那个社会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般的社会不一样。我把他们叫作底边阶级，因为他们是最底层的，也是边缘的。他们自认为是下九流，上九流最低的一层是农民，农民是上九流中最低的，下九流中最低的是“七优、八娼、九吹手”，吹鼓手是下九流中最低的。我研究完乐户后，就想做整个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的研究。我觉得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社会组织与主流社会不一样，能够表现它的是《水浒传》里的描写，他们特别讲究义气。所以我说我研究的是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

我第二个计划，是从1999年开始做的，已经做完了。它包括以下几种：首先是山西的乐户，但是跟乐户共存的另一种社会阶级，比乐户地位高一点，叫作红衣行。他们不是贱民，山西也有。另外就是剃头匠，山西的长子县那个地方专门出剃头匠。还有就是河北吴桥的杂技艺人，北京天桥的说唱艺人，相关的这些我们都研究了。我们没有到南方，因为钱不够。台湾的国科会给钱太少，而且限制在大陆，每年只能有15万新台币。蒋经国基金会那一次钱是300万新台币，那时候台币很值钱，等于是100万人民币。这次钱只有60万新台币，那怎么够呢？不够。研究是研究完了，报告也交了，但是我觉得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正在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研究再做一做，而且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还没有人弄过。虽然说现在有些人在研究边缘社会，但我这个绝对不是边缘社会，我想就叫底边阶级、底边社会。有一些文章出来，总的田野报告交给国科会了。田野报告还没到能够出版的程度，所以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这个计划对国科会是交代完了，但是我自己是想找一点时间把它写出来。这学期我在东华大学新开了一门课，这门课也是关于中国的，叫作“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就想把我这几年来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一些研究总结一下，这里头最近的研究就是对底边阶级的研究。

我到香港以后，除了做少数民族研究以外，也做汉族的研究。当时我

到香港的时候，正好碰到“文化大革命”。1973年，林彪已经死了。林彪死了以后，中国大陆出了很多批林批孔的文章，就是揭露林彪的黑材料，黑材料就是讲林彪怎么用阴谋诡计。我发现这个确实是一批很有意思的材料。接下来，批林批孔完了以后，“四人帮”垮了。“四人帮”垮了以后，又批“四人帮”，又有黑材料。这些资料我收集了很多。我做了一些研究，第一个研究是关于样板戏的，只写了一篇文章，书没有写出来。接着就是“中国人的计策行为”，比如三十六计，这个原本想写一本书，也没有写完，但是最后文章写了不少，有十几篇，都发表了，有一大半是英文，那时候还是写英文比较多。还有一个，我也做过有关中国人的关系的研究，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在台湾发表的。这个问题，那时候还没有人注意，还有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热门了。从1975年开始，我先研究样板戏，接着是计策行为，断断续续地一直研究了十几年，没有做过实地的调查，但是那时候访问过不少从大陆到香港的干部，所以，可以说有一些田野资料。

我现在教“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这门课，我希望将来写本书把它总结一下。我想在这里强调几点：第一点是需要有一个理论；第二点就是要根据田野资料，不像过去主要是文献资料；第三点就是要有本土性的观念，有很多观念是从我们自己对中国人的理解得出来的，不是说模仿、抄袭外国人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综合我这几年来对计策行为、关系的研究，以及从1994年开始的对汉族乐户、底边阶级的一些田野调查，写一本书，就用我现在开的这门课的名字命名——《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

所以总的来说，我的学术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1年，这是第一个阶段，主要做高山族的研究；1961年去了美国，最先是念书，后来是做印第安人的研究，1973年到了香港以后，主要在研究香港的民间风俗、中国的少数民族，这是第二个阶段；差不多从90年代开始，我回归到汉族社会研究，这是第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大概就是这样。

问：您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将近50年了，当然如果从1954年算起，2004年就是50年，如果从1955年算起，2005年就是50年，到时候我们要给您开一个讨论会。但是现在，乔先生您也感觉到，人类学在中国的新的崛起这个大的背景下，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社会科学各个